

云南省龙陵县大花石遗址发掘简报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大花石遗址位于云南保山市龙陵县怒江畔，出土有打制石斧、石锛、石刀等石器，出土陶片有红、褐、黑三种色素，纹饰比较丰富，器形有罐、钵、纺轮、豆四类。该遗址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滇西南地区的文化面貌，揭示了与西北、岷江上游同类遗址存在着某种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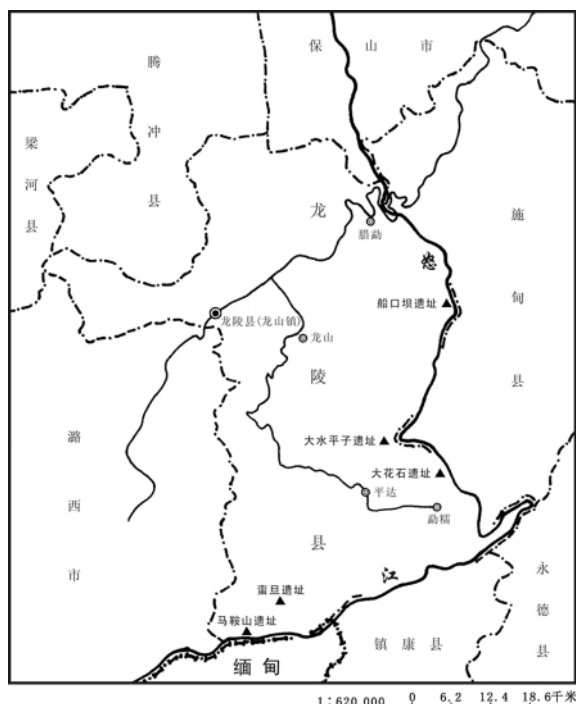
关键词：云南龙陵；大花石遗址；石斧；新石器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1)02-002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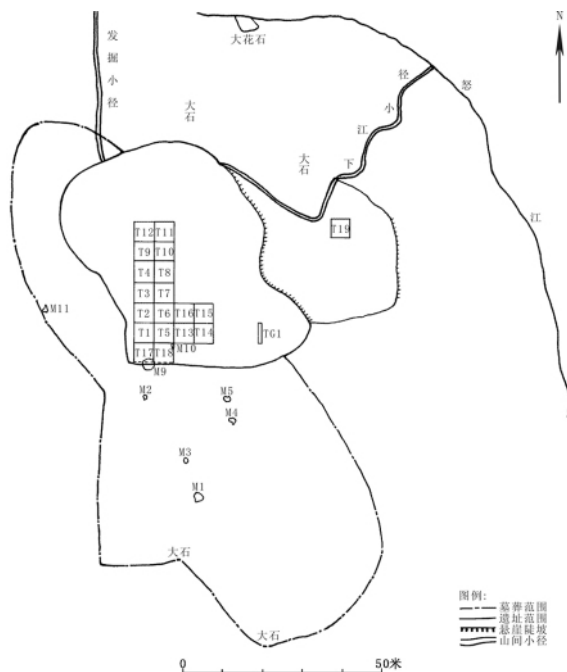
大花石遗址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东南方向的勐糯乡大田坝村东怒江边，属怒江两岸的二级台地（图一；彩版一，1、2），三面环山，东濒怒江，遗址总面积约 3300 平方米。这一地区古称蛮荒地，东汉时设永昌郡。自古以来永昌就是内地通往西方和东南亚各国的通道，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境内居住着哀牢人、濮人、昆

明人、掸人等，其首领均称王，当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永昌郡辖八县，有不韦（今施甸）、嵩唐（今保山）、比苏（今云龙）、叶榆（今大理喜州）、邪龙（今巍山）、云南（今祥云云南驿）、哀牢（今德宏大盈江地区）、博南（今永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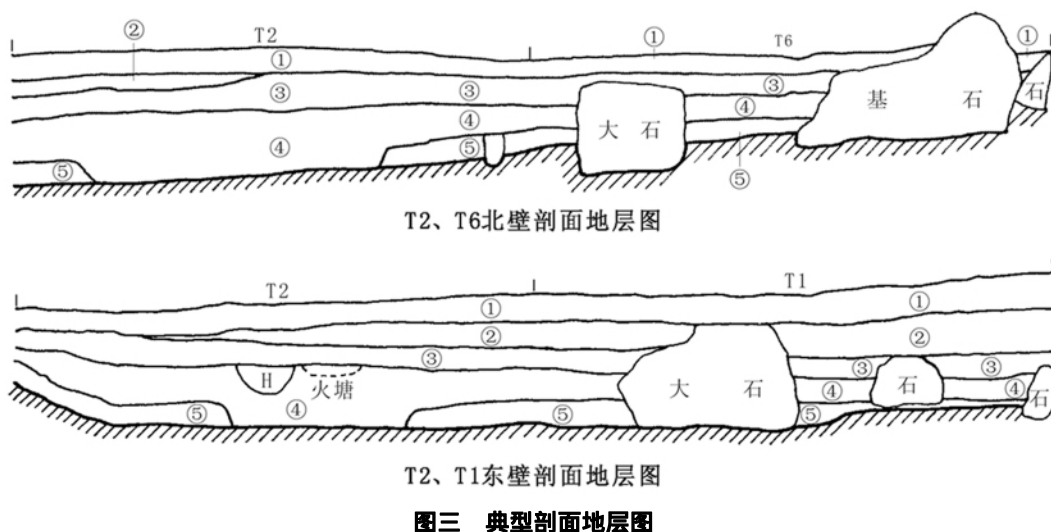
1987 年在此采集到石器和陶片若干。1990 年初进行过试掘，文化层厚约 1 米，出土铜丝、石器和陶片等。1991 年 11 月 18 日至 1992 年 1



图一 保山市龙陵县大花石遗址地理位置图



图二 布方示意图



月 7 日，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与保山地区文管所、龙陵县文化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科研性主动发掘。该遗址的发掘为怒江以西地区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区位于怒江第二级台地的遗址中部，共布 5×5 米探方 18 个，在第一级台地布方 1 个，另开 5×1 米探沟一条，合计发掘面积 480 平方米（图二）。

一、地层堆积

遗址地层堆积较为简单，堆积深度一般在 0.5~0.8 米左右。依据土质、土色区别，遗址自上而下统一划分为 5 层（图三）。

第①层：耕土层，厚度 10~25 厘米，土质疏松，黑褐色。

第②层：在遗址中不完全分布，厚度 0~25 厘米。为遗址废弃后的一个自然沉积层，腐质物多，故呈黑灰色。中杂有陶片及石器，有铜屑出土。

第③层：覆盖整个发掘区，为黑褐色花土，土质较硬。包含物极多，陶片、石器丰富，红烧土颗粒亦多。厚度为 15~30 厘米，为主要文化层。

第④层：覆盖大部分发掘区，为黄褐色花土，土质较紧密，红烧土、炭屑等颗粒较多。厚度为 0~30 厘米。包含物较③层少，主要为石器、陶器。

第⑤层：覆盖部分发掘区，为黄花土，土质较紧密，粘性。有极少量红烧土颗粒及碳屑，包含物也较少，出土少量陶片及石器。厚度 0~20 厘米。⑤层下即为黄色生土及基岩。

③、④、⑤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层。其中③层遗物较为丰富，多打制石器及陶器，③层下有房基一座、大量无规律柱洞及三个灰坑遗迹。④层遗物较③层少，多红烧土、炭屑等，④层下有房基一座，并发现有居住面、柱洞和灰坑一个。⑤层包含物极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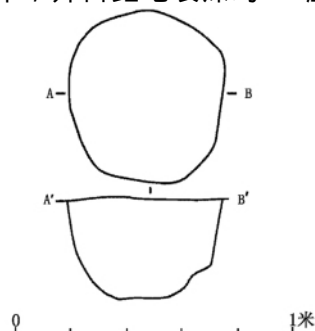
二、文化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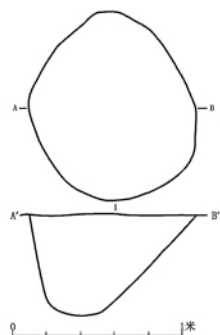
遗址发掘区域遗迹较少，计有灰坑 6 个，可辨形状和规律的房基二座，大量无规律柱洞由于不能复原房屋结构，不能归入遗迹单位。

1. 灰坑

H1 位于 T2②层下，开口距地表深 50 厘米，打破③、④层。坑口呈不规则圆形，直径为 75~80 厘米，坑深 38 厘米。坑内填土黑灰色，土质疏松，含沙较多、坑内包含物有砾石一块及少量石料、陶片。

H3 位于 T2③层下，开口距地表深约 60 厘米，打破④、⑤层。坑口圆形，坑口直径 55 厘米，坑底直径 35 厘米，坑深 36 厘米。坑内填土黑灰色，土质疏松。包含物有陶片及残石器（图四）。





图五 H5 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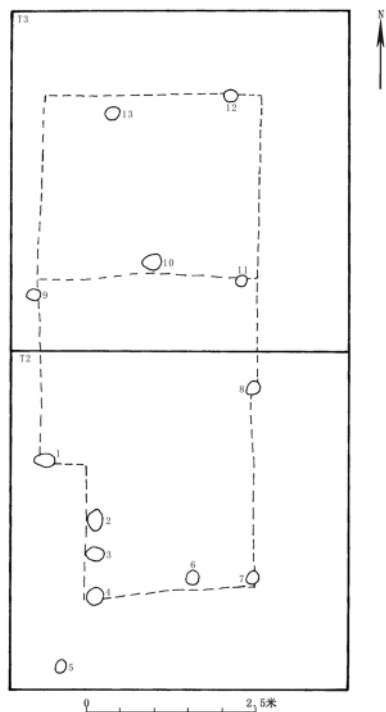
H5 位于 T9③层下,打破⑤层及生土(T9 无④层)。坑口椭圆形,长径 115、短径 95 厘米,坑深 58 厘米。坑内填土黄褐色,含红烧土及炭屑颗粒。坑底出打制石斧、磨光锛和石片各 1 件,陶纺轮 1

件及较多陶片(图五)。

H6 位于 T5④层下,打破⑤层及生土。坑口为椭圆形,长径 225、短径 210 厘米,坑深 25~30 厘米。坑内填土黑灰色,土质松软含红烧土块,填土中包含大量陶片,另有磨制梯形石斧、箭簇、砺石等石器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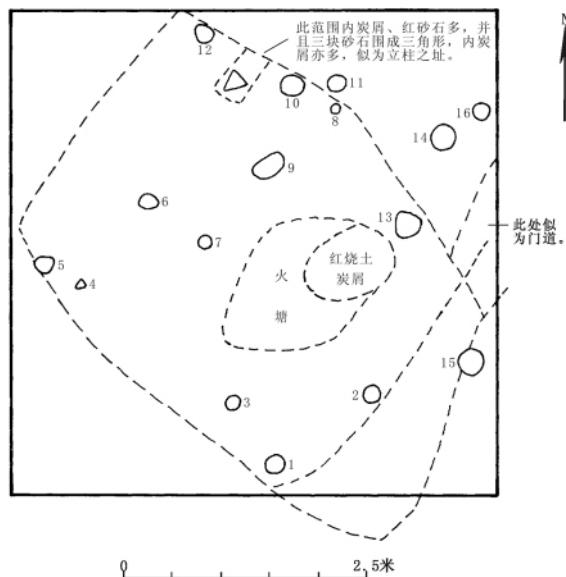
2. 房基

F1 位于 T2、T3 两探方的③层下,主要集中在 T2 偏西和 T3 南部,柱洞开口距地表深约 50~70 厘米。按照柱洞排列方向和形状,判断 F1 为长方形房屋。柱洞呈东西和南北方向排列,共 8



图六 F1 平面图

1. 柱洞: 深 10 厘米 2. 柱洞: 深 13 厘米 3. 柱洞: 深 17 厘米
4. 柱洞: 深 8 厘米 5. 柱洞: 深 12 厘米 6. 柱洞: 深 13 厘米
7. 柱洞: 深 9 厘米 8. 柱洞: 深 13 厘米 9. 柱洞: 深 12 厘米
10. 柱洞: 深 14 厘米 11. 柱洞: 深 9 厘米 12. 柱洞: 深 9 厘米
13. 柱洞: 深 9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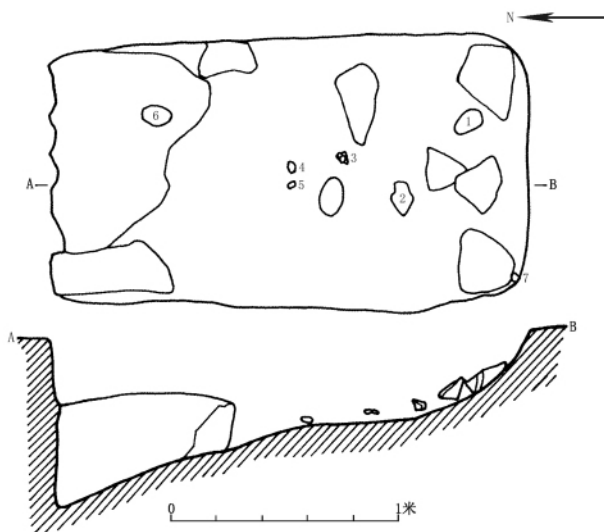


图七 F2 平面图

1. 柱洞: 深 14 厘米 2. 柱洞: 深 15 厘米 3. 柱洞: 深 20 厘米
4. 柱洞: 深 8 厘米 5. 柱洞: 深 11 厘米 6. 柱洞: 深 10 厘米
7. 柱洞: 深 13 厘米 8. 柱洞: 深 12 厘米 9. 柱洞: 深 20 厘米
10. 柱洞: 深 14 厘米 11. 柱洞: 深 15 厘米 12. 柱洞: 深 10 厘米
13. 柱洞: 深 12 厘米 14. 柱洞: 深 10 厘米 15. 柱洞: 深 10 厘米
16. 柱洞: 深 10 厘米

个,直径一般在 20 厘米左右,深约 10~20 厘米。房屋长约 4.5、宽约 3 米。在 F1 内发现有大量红烧土、炭屑、石器及石片(图六)。

F2 位于 T2④层下,有较坚硬的居住面,并出现一批有规律分布的柱洞,房内还发现火塘遗迹。F2 长约 4.1、宽约 3.5 米。居住面土色为黄褐色花土,偏黑、红烧土、炭屑较多,土质紧密、平整(图七)。在其范围内发现有大量的石



图八 M2 平、剖面图

1. 砾石 2. 石斧 3. 残陶片 4. 石纺轮 5. 残陶片
6. 砾石 7. 砾石

器、石片等。

另外还发现有一些发掘者认为是墓葬的遗迹，共十一座，编号 M1 ~ M11。这些墓葬大多不在布方区，而主要位于山体向江面延伸下来的山坡处。在地面上表现为一个个由大、小石块垒成的石堆。现以 M2、M4 为例。

M2：位于发掘区的南部，北距 T17 约 9 米。墓口距地表 80 厘米，长 205 厘米，宽 110 厘米。方向正北。平面近长方形，壁及底均不规整。无人骨发现，墓内发现的器物主要为陶片、石器、砾石等（图八）。

M4：位于发掘区东南方陡坡一巨石上方。墓口距地表 22 厘米，长 240 厘米，宽 1.6 厘米。方向正北。平面近椭圆形，壁及底均不规整。无人骨发现，墓内发现的器物主要为陶片、石器、砾石等（图三一）。

这些所谓的墓葬形制奇特，墓坑上方多为大石，墓壁和墓底极不规整；墓内多充填有巨石，出土器物破碎不堪，其形制、组合与地层相同；墓内无人骨发现。其是否为墓葬存在争议。

三、遗物

主要为石器、陶器，另外还在文化层中发现有残铜丝、铜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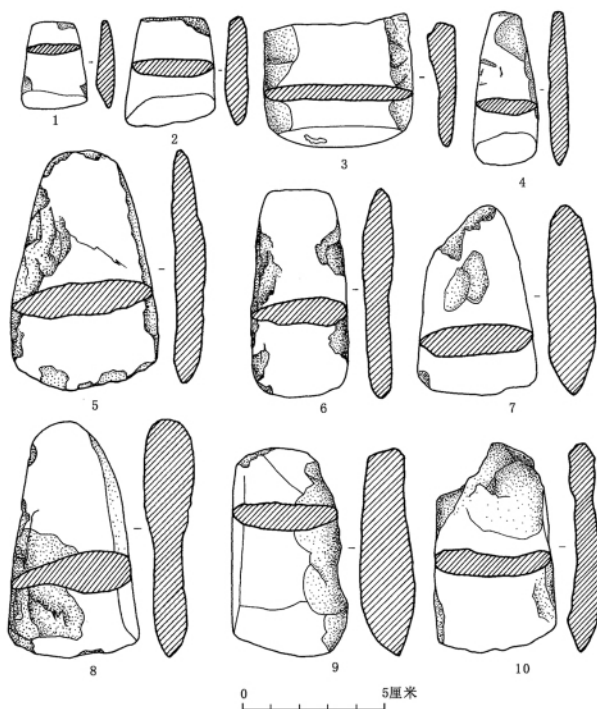
（一）石器

可辩器形者 1704 件，另有大量石料及未加工成型者。

制作石器的石料应选自怒江河滩散布的河卵石，多为深灰色。亦有红色砂质板岩，主要用做砾石及石范。

这些石器可分为人工制品和人工用品两大类。

石器根据制作方式又可分为磨制石器、打制石器两种。磨制石器有石锛、石斧、石箭簇、石纺轮、石环、石刀、石锥等，共 310 件。打制石器数量最多，共 1254 件，主要为打制石斧和刮削器。此外，还出土一些其他石器，如砾石、石范、以及石拍。砾石使用痕迹明显，共 140 件。石范制作规整惜均残，共 3 件。石拍仅发现 1



图九 磨制石锛

1. T17③:129 2. T1⑤:8 3. T5④ 4. T5④:6 5. T6③:59
6. T6④:4 7. T1⑤:4 8. T11⑤:1 9. T19④:1 10. T2③:14

件。另有大量石料和未加工成型的石核形状各异，数量无法统计。

（1）磨制石器

锛：146 件。绝大多数呈梯形，个别长条形。有正锋、偏锋两种。正锋者一面利用河卵石的天然弧度、一面磨光，亦应视为偏锋。制作时均先经打击并修理成形后通体磨光而成。该类器物由于体形较小，一般长在 3~7 厘米、刃宽 2.5~4.5 厘米之间，无斧之厚重，故将该类磨制石器均定为锛而未分出斧。

T17③:129，梯形，平顶，偏锋，刃部较平。长 3.1 厘米、刃宽 2.3 厘米（图九，1）。

T1⑤:8，梯形，平顶，偏锋，斜平刃。长 3.9 厘米、刃宽 3.2 厘米（图九，2）。

T5④，梯形，顶端断裂，偏锋，弧刃。长 4.7 厘米、刃宽 5.2 厘米（图九，3）。

T5④:6，条形，顶较平，偏锋，弧刃。长 5.5 厘米、刃宽 2.2 厘米（图九，4）。

T6③:59，梯形，弧顶，偏锋，弧刃。长 8.5 厘米、刃宽 5.2 厘米（图九，5）。

T6④:4, 条形, 平顶, 正锋, 刃部较平、钝。长7.4厘米、刃宽3.4厘米(图九, 6)。

T1⑤:4, 梯形, 顶端一角人为打制破裂, 偏锋, 平刃。长6.8厘米、刃宽4.2厘米(图九, 7)。

T11⑤:1, 梯形, 尖弧顶, 偏锋, 平刃。长9.1厘米、刃宽5厘米(图九, 8)。

T19④:1, 梯形, 弧顶, 偏锋, 斜平刃。长7.4厘米、刃宽4.1厘米(图九, 9)。

T2③:14, 梯形, 顶端一角破裂, 偏锋, 刃部较平。长7.4厘米、刃宽4.3厘米(图九, 10)。

箭簇: 113件。长度均在7厘米以下。依其形状分三型。

A型: 81件。尖叶形。

T1④:78, 翼凸脊, 铤部磨扁平。长5.8厘米、叶宽1.9厘米(图一〇, 1)。

T1⑤:13, 翼前端较宽, 凸脊, 无铤。长6厘米、叶宽2.8厘米(图一〇, 2)。

T17④:26, 翼凸脊, 铤部磨扁平。长6厘米、叶宽2.2厘米(图一〇, 3; 彩版二, 8)。

B型: 22件。长条形。

T1④:77, 前端凸脊。长5.3厘米、叶宽1.3厘米(图一〇, 4)。

T2⑤:3, 凸脊。长6.6厘米、叶宽1.7厘米(图一〇, 5)。

C型: 10件。截面呈三角形。

T2④下:3-4, 残。长5.7厘米、叶宽3厘米(图一〇, 6)。

石锥: 5件。圆柱锥形。

T17④:29, 一端磨尖, 长8.3厘米、直径0.9厘米(图一〇, 7)。

石纺轮: 29件。圆形, 中心有一钻孔。

T1⑤:1, 直径9厘米、厚1厘米(图一〇, 8)。

石刀: 2件。均残。

H2, 石片通体磨制而成, 新月形, 凸刃, 凹背, 背部中央故意磨制出更深的一道凹弧。残长约1厘米、宽4厘米左右(图一

〇, 10)。

T7②:30, 石片通体磨制而成, 平刃, 凸背, 背部有一圆形穿孔。残长8厘米、最宽处3.8厘米(图一〇, 11)。

异形石器: 17件。形状各异, 经磨制, 用途不明。

T2③:66, 腰形, 长11.6厘米、宽8.9厘米、厚2.2厘米(图一〇, 9)。

(2) 打制石器

斧: 1128件。均用河卵石加工而成。依加工修理形状, 分四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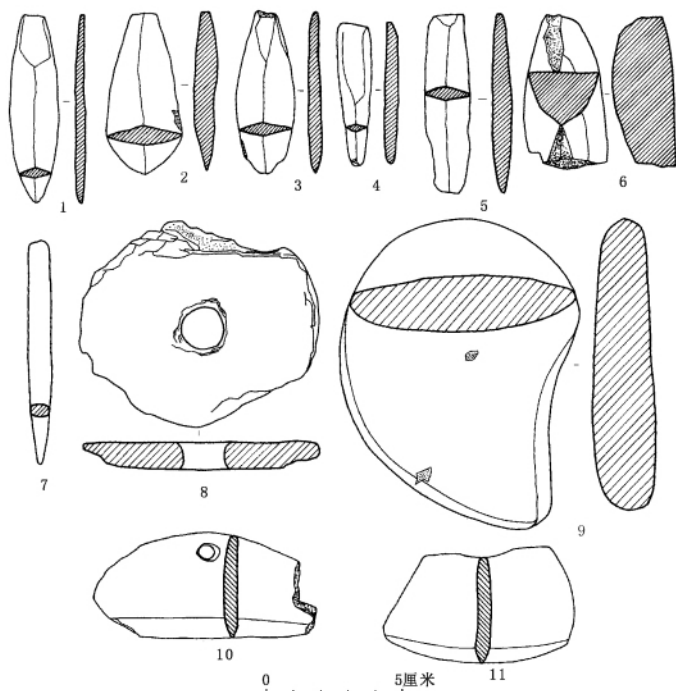
A型: 263件。多为梯形, 有少量长条形, 两侧有打制痕迹, 但肩部不明显。

T2③:3-1, 梯形, 弧顶, 弧刃。长12.1厘米、刃宽7.1厘米(图一一, 1)。

T2④:48-1, 条形, 平顶, 刃部较平。长8.6厘米、刃宽4.5厘米(图一一, 2)。

B型: 211件。梯形, 两肩有打制痕迹, 但肩部并不突出。

T18③:45, 弧顶, 肩部较高, 近半圆形刃。



图一〇 石箭簇及其它磨制石器

1~3. A型石箭簇(T1④:78、T1⑤:13、T17④:26) 4、5. B型石箭簇(T1④:77、T2⑤:3) 6. C型石箭簇(T2④下:3-4) 7. 石锥(T17④:29) 8. 石纺轮(T1⑤:1) 9. 异形石器(T2③:36) 10、11. 石刀(H2、T7②:30)

长 11.2 厘米、刃宽 6.9 厘米 (图一一, 3)。

T5③:94, 平顶, 肩部较低, 弧刃。长 9.4 厘米、刃宽 6.4 厘米 (图一一, 4)。

C 型: 542 件。打制双肩, 双肩突出且明显。

T5③:17, 平顶, 肩部较高, 近半圆形刃。长 11.6 厘米、刃宽 8.9 厘米 (图一一, 7)。

T12③:39, 平顶, 肩部较低, 新月形刃。长 7.7 厘米、刃宽 10.8 厘米 (图一一, 8)。

D 型: 112 件。打制双肩, 双肩突出、肩刃部不对称。

T5③:89, 弧顶, 肩部较低。长 10.7 厘米、刃宽 9.2 厘米 (图一一, 5)。

T6③:30, 弧顶, 肩部较高。长 10.2 厘米、刃宽 7.2 厘米 (图一一, 6)。

刮削器: 126 件。薄片状, 利用敲击河卵石的剥离面形成的锋尖使用。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是制作石斧的余料。

T5④:26, 近圆形。长 6.9 厘米、刃宽 6.8 厘米 (图一二, 1)。

T5③:23, 近椭圆形。长 8.2 厘米、刃宽 4.9 厘米 (图一二,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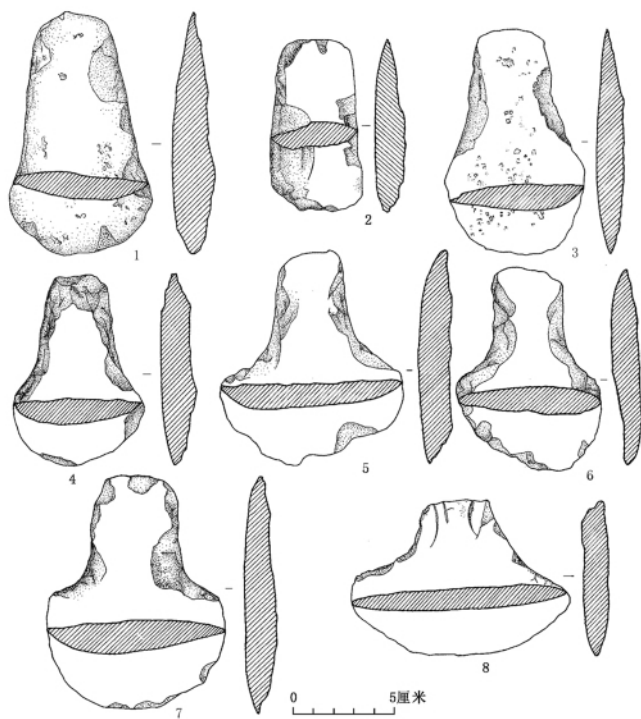
(3) 其他石器

石拍: 1 件。M5, 长 10.5 厘米, 当是制作陶器上方格印纹的工具 (图一二, 3)。

范: 3 件, 均残, 用砂岩制成。其中一件在后面墓葬随葬器物中介绍。

T17③: 106, 黄色砂岩, 一面琢刻出浅槽, 槽形似一钺 (斧)。槽所在一面残留有黑色物质。器体经过较细致的修整, 大致成一方形。槽仅深约 0.2 厘米, 估计当有另一石范与其扣合使用。长约 10.5 厘米、宽度不明 (图一二, 4)。

T18③:18, 黄红色砂岩, 一面琢刻出弧形凹槽, 槽面颜色呈灰黑色, 所铸器形不明。另一面修整为弧形。从整个形制来看可能为单范。残长 7.2 厘米、宽约 5 厘米, 凹槽最深处约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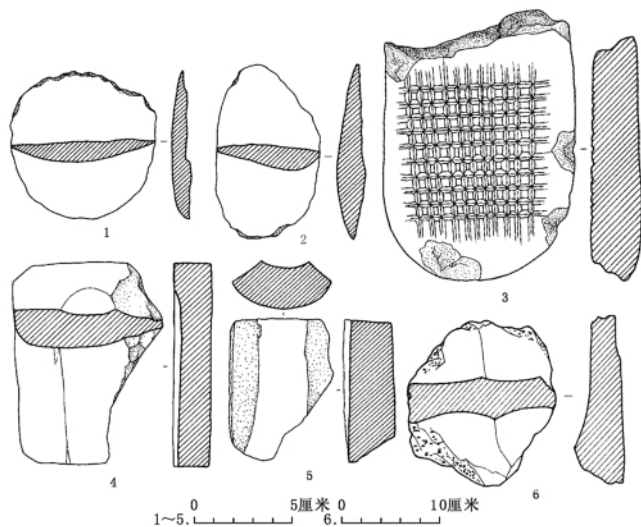
图一一 打制石斧

1、2. A 型(T2③:3-1、T2④:48-1) 3、4. B 型(T18③:45、T5③:94)
5、6. D 型(T5③:89、T6③:30) 7、8. C 型(T5③:17、T12③:39)

厘米 (图一二, 5)。

砺石: 140 件。均为红色砂岩, 有磨痕。

T1⑤:10, 不规则形, 表面有两道磨痕。长 17 厘米、宽 15 厘米 (图一二, 6)。



图一二 其它石器

1、2. 刮削器(T5④:26、T5③:23) 3. 石拍(M5) 4、5. 石范(T17③:106、T18③:18) 6. 砺石(T1⑤:10)

(二) 陶器

该遗址出土陶器数量较多,以夹细砂陶为主,夹粗砂陶次之另有少量泥质陶。陶器火候不是太高,因为在烧制时气氛及温度不一,同一块陶片表面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我们根据主体颜色作为划分陶色的依据,将所出的陶片大致分为红、褐、黑三种色系,尤以褐系陶为主。陶器多出自地层,以残片为主,难于拼对,很少有完整器物。

陶片纹饰丰富,我们大体将其分为细绳纹、粗绳纹、篮纹、刻划纹、戳印纹、压印纹、乳钉纹七大类。其中刻划、戳印、压印这三种装饰手法所表现出的具体纹饰形状多样、极为丰富。每一件器物或陶片上的纹饰通常由几种纹饰组合而成,许多器底都装饰有压印方格纹(图一三)。见附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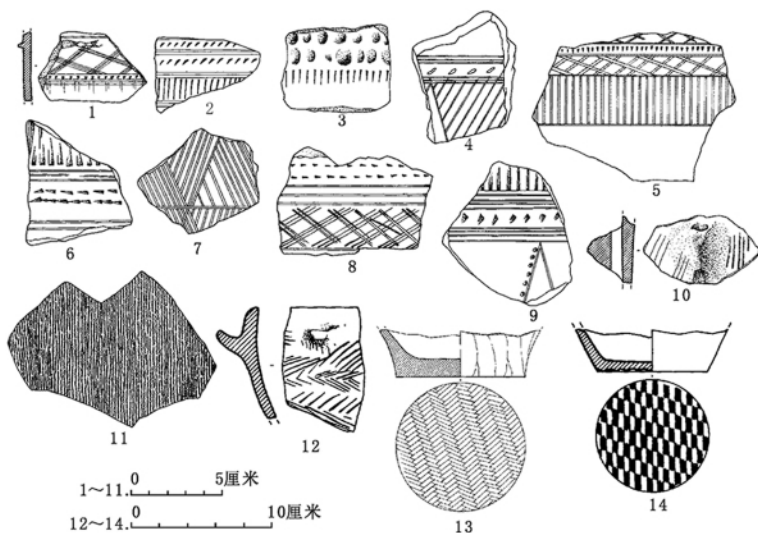
器型较少,主要有罐、钵、纺轮、豆四类。下面将分类举例介绍。

罐:均为残片,无完整器。根据口部形态差异将其分为五型。

A 型:大侈口,卷沿。根据器表口沿下方装饰纹饰的不同可分为三个亚型。

Aa 型:器表口沿下方装饰剔刺纹或刻划纹。根据侈口外翻幅度的变化可分为三式。

I 式:口微翻。



图一三 陶片纹饰

1. T5⑤ 2. T1⑤ 3. T18⑤ 4. T1④ 5. T1④ 6. T5④ 7. T2④ 8. T5④
9. T19④ 10. T19③ 11. T13③ 12. T5③ 13. T18③ 14. T2④

T1⑤,夹细砂红陶,圆唇,表面装饰剔刺纹。残高 5.6 厘米,口径 18 厘米(图一四,1)。

II 式:外翻幅度稍比前一式大。

T17④,夹细砂红陶,尖圆唇,表面装饰剔刺纹、刻划斜线纹、弦纹。残高 6.4 厘米,口径 31.2 厘米(图一四,2)。

III 式:外翻幅度更大。

T18③,夹细砂红陶,尖圆唇,表面装饰刻划斜线纹、弦纹。残高 7.4 厘米,口径 28 厘米(图一四,3)。

Ab 型:器表口沿下方装饰附加堆纹。

T2④,夹细砂红陶,尖圆唇,表面装饰附加堆纹、刻划纹。残高 4.6 厘米,口径 28.4 厘米

附表

陶质	陶色	纹 饰																			
		细绳纹					粗绳纹					篮纹					刻划纹				
		②	③	④	⑤	②	③	④	⑤	②	③	④	⑤	②	③	④	⑤	②	③	④	⑤
泥质	红色		12														11				90
	褐色	45															6				
	黑色																	3			10
夹细砂	红色	42	125	9	10					30	75	64	5	99	382	114	17	185	303	344	114
	褐色	33	67			3				30	72	54	22	44	219	111	21	130	323	266	119
	黑色	21	17							19	31	31	10	39	87	62	17	93	146	229	64
夹粗砂	红色	3				2	8			3	4			13	2			16	6		1
	褐色					5	2			2				5	3			1	5		
	黑色	5	1							1	2							3	5		

(图一四, 4)。

Ac 型: 器表口沿下方装饰按窝纹。

T13③, 夹细砂黑陶, 圆唇, 表面装饰按窝纹、刻划纹。残高 7.2 厘米, 口径 45.2 厘米(图一四, 5)。

B 型: 长领, 侈口。根据侈口外翻幅度的变化可分为三式。

I 式: 口微翻。

T1⑤, 夹细砂红陶, 圆唇, 表面装饰戳印纹、剔刺纹、弦纹等。残高 5.4 厘米, 口径 14 厘米(图一四, 6)。

II 式: 外翻幅度稍比前一式大。

T18④, 夹细砂褐陶, 尖唇微下垂, 表面装饰剔刺纹、弦纹等。残高 6.6 厘米, 口径 19.6 厘米(图一四, 7)。

III 式: 外翻幅度更大且颈部有变短的趋势。

T17③, 夹细砂黑陶, 尖唇, 沿面装饰有一周凹弦纹, 颈部较短, 表面装饰刻划纹。残高 4.8 厘米, 口径 14.2 厘米(图一四, 8)。

C 型: 口微敛, 唇外翻。根据口部内敛的程度可分为两式。

I 式: 微敛。

T1④, 夹细砂红陶, 折沿, 尖唇, 表面装饰刻划纹。残高 3.6 厘米, 口径 22 厘米(图一四,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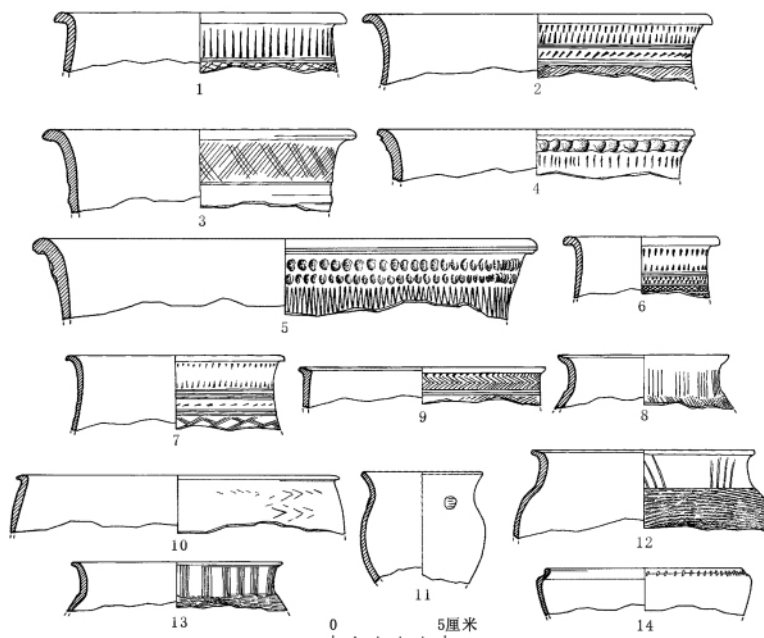
II 式: 口更敛。

T2③, 夹细砂褐陶, 卷沿, 尖唇, 表面装饰刻划纹。残高 4 厘米, 口径 20 厘米(图一四, 10)。

D 型: 侈口, 短束颈。根据口部外侈的程度及唇部外翻程度可分为三式。

I 式: 唇部几乎不翻, 口部外侈程度较小。

T16⑤, 泥质红陶, 方唇, 颈部有乳突。残



图一四 陶罐

1. Aa 型 I 式(T1⑤) 2. Aa 型 II 式(T17④) 3. Aa 型 III 式(T18③) 4. Ab 型(T2④) 5. Ac 型(T13③) 6. B 型 I 式(T1⑤) 7. B 型 II 式(T18④) 8. III 式(T17③) 9. C 型 I 式(T1④) 10. II 式(T2③) 11. D 型 I 式(T16⑤) 12. D 型 II 式(T5④) 13. D 型 III 式(T1③) 14. E 型(T12③)

高 10 厘米, 口径 10.8 厘米(图一四, 11)。

II 式: 唇部微外卷。

T5④, 夹细砂褐陶, 圆唇, 表面装饰篮纹。残高 7.8 厘米, 口径 20 厘米(图一四, 12)。

III 式: 口部外侈程度较大, 唇部近折平沿。

T1③, 夹细砂褐陶, 近折平沿, 尖圆唇, 表面装饰刻划纹、篮纹。残高 4.4 厘米, 口径 18 厘米(图一四, 13)。

E 型: 子母口。

T12③, 夹细砂黑陶, 敛口, 圆唇, 口部装饰一周指甲纹。残高 4.2 厘米, 口径 17.4 厘米(图一四, 14)。

钵: 绝大多数为口沿残片, 亦有部分完整者。这些钵根据其口部外侧下方纹饰的不同可分为三型。

A 型: 口部外侧下方为素面或各种刻划纹。根据其腹部深度的变化可分为三式。

I 式: 腹部较浅。

T1⑤, 夹细砂红陶, 敛口, 尖唇, 素面。残高 4.6 厘米, 口径 26 厘米 (图一五, 1)。

Ⅱ式: 腹部加深。

T2④:49, 完整, 泥质红陶, 敛口, 尖唇, 平底, 素面。残高 8 厘米, 口径 14.4 厘米, 底径 7.6 厘米 (图一五, 2)。

Ⅲ式: 腹更深。

T5③, 夹细砂褐陶, 敞口, 尖唇, 素面。残高 5.4 厘米, 口径 12.8 厘米 (图一五, 3)。

B 型: 口部外侧下方为附加堆纹。根据口部形态及腹部深度的变化可分为两式

I 式: 敞口, 腹部较深。

T5③, 夹细砂黑陶, 尖唇。残高 6 厘米, 口径 15.2 厘米 (图一五, 4)。

T12③, 夹细砂红陶, 尖唇。残高 7.2 厘米, 口径 28 厘米 (图一五, 5)。

Ⅱ式: 敛口, 腹部较浅。

T3②, 夹粗砂黑陶, 圆唇。残高 2.8 厘米, 口径 24 厘米 (图一五, 6)。

C 型: 口部外侧下方为四个乳突纹, 仅此一件。

T17③, 夹细砂褐陶, 平沿, 方唇, 圈足。高 9.5 厘米, 口径 17 厘米, 底径 7.4 厘米 (图一五, 7)。

豆柄: 1 件。

T3③, 夹细砂红陶。残高 20 厘米, 柄直径 7.2~8.4 厘米 (图一五, 8)。

纺轮: 形制简单, 均为圆饼状。

T2③:28, 夹细砂黑陶。直径 3.8 厘米, 厚 1.1 厘米 (图一五, 9)。

T2③:24, 直径 3.6 厘米, 厚 0.8 厘米 (图一五,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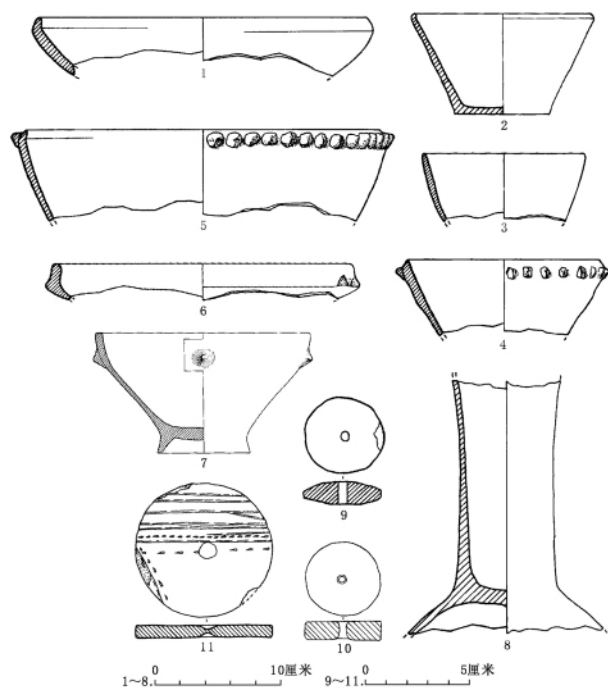
T1④:34, 夹砂褐陶, 用一陶器残片改制而成。表面有戳印纹等纹饰。中央有一两边对穿而又并未钻通的圆孔。直径 6.5 厘米、厚 0.6 厘米左右 (图一五, 11)。

五、结语

龙陵大花石遗址的发掘是当时怒江流域一次重要的考古发掘。此次发现的遗迹以及出土的大量遗物为揭示该流域的早期文明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实物资料。

遗址文化层堆积比较简单, 共五层, 其中③④⑤层为未经扰乱的早期文化堆积。在这三层文化堆积中出土了石器、陶器等大量遗物, 并发现了如房子、灰坑等一定数量的遗迹。对比这三个文化层出土的器物, 我们可以发现其形制流变、组合等变化不太明显, 这说明遗址的延续时间不会太长。T6、T11、T19 的第三层中均出有铜制品, 而且很明确是未经扰乱的。此外还出土有石范, 这说明该遗址先民应该会自己制作铜器。鉴于发掘的标本没有作科学检测, 并考虑到出有铜器这一客观情况, 再联系遗址延续时间不会太长的分析, 我们初步认定其时代为新石器晚期到铜器时代这一过渡时期。

遗址位于怒江流域, 其出土器物同附近澜沧江流域已发掘的云县曼干^[1]、忙怀^[2]等遗址以及近年来为配合糯扎渡水电站而发掘的 (下转第 79 页)



图一五 陶钵及其它陶器

1. A 型 I 式钵 (T1⑤) 2. A 型 II 式 (T2④:49) 3. A 型 III 式 (T5③) 4. 5. B 型 I 式钵 (T5③、T12③) 6. B 型 II 式钵 (T3②) 7. C 型钵 (T17③) 8. 豆柄 (T3③) 9~11. 纺轮 (T2③:28、T2③:24、T1④:34)

2、填补了该地区石刻艺术的空白

《袁国琰死事碑记》，其精美的雕刻艺术体现着明显的时代特征。此碑具有明确的纪年，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此它可作为标准器，以对同时期的碑刻和书法作品进行可靠的参考与鉴定。同时，清乾隆两金川之役前，大小金川两地没有石刻碑文等文化现象，战争中和战争后，石刻文化才在此地兴起并逐步发展。它是由清兵带入的艺术品种，是一种战争的产物，它不仅填补了该地区石刻艺术的空白，而且还发展成为特定环境的代表性艺术品种。所以，有明确纪年的《袁国琰死事碑记》对研究清乾隆时的碑刻艺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袁国琰死事碑记》还为研究清军将领袁氏兄弟的祖籍、从戎经过以及大小金川战役的情况提供了实物资料，弥足珍贵。本文略作考释，希

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注释：

[1] [英] 霍西 《1904 年霍西先生中国藏区东部游》。

[2] 《阿坝州志·文物志》（初稿）第 228 页收录了碑文。

[3] [4] [6] [7] 据《清史稿·职官志》卷八十九～卷九十四，《二十五史》第 1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年出版。参见戴逸总主编《二十六史大辞典·典章制度卷》第 895 页、第 892 页、第 892 页、第 895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又参见徐连达主编《中国历代官制词典》720 页，812 页，989 页，88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5] 雀丹 柯正才 洛桑著《乾隆金川之役》第 110 页。

[8] [9] 清·同治《直隶理番厅志》卷三《学校志五·忠义》。

[10] 清·同治《直隶理番厅志》卷三《学校志八·人物》。

[11] 参见《二十五史》第 12 册 1267～126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年出版。

（上接第 30 页）

南北渡^[3]、白银渡^[4]等遗址的出土器物相似。另外，为配合基建在附近区域调查采集的石器等也同其相似。怒江与澜沧江同为南北流向的国际河流，在这一范围内两流域有着相似的自然环境。上述现象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滇西南地区相近的文化面貌。但不同遗址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比如大花石出土的陶器以平底为主而南北渡则以圈足为主等等。至于其内部具体类型的区分还有待材料的进一步完善和研究的深入。该遗址发现的器物还同省外许多遗址相似。比如石器的制作工艺及外形同中堡岛^[5]、宜都红花套^[6]等长江中游的遗址相似；双肩石斧、侈口罐、穿孔半月形石刀等同西藏昌都卡若遗址^[7]、西北新石器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陶器的纹饰如附加堆纹等同西北、岷江上游遗址的同类纹饰相近。由此来看，大花石遗址同上述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当存在着某种联系。

附记：本次发掘领队为王大道。参加发掘的人员有蒋志龙、杨帆、张聪、梁银、李枝彩、耿德铭、杨复兴、张玉群、王黎锐、王锦麟、李芸、李正、杨升义、范南丹。绘描图：刘春城、余朝臣、张璐、李蕊、王锦丽。插图制作：余朝臣、刘春城。

执笔：杨帆、万杨

注释：

[1] 戴宗品《云南云县曼干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2004 年第 8 期。

[2]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云县忙怀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77 年第 3 期。

[3] 未发表，资料存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4] 未发表，资料存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5] 佟柱臣《中国新石器研究》（上）巴蜀书社，中国，成都。

[6] 佟柱臣《中国新石器研究》（上）巴蜀书社，中国，成都。

[7]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79 年第 9 期。